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 人文中国/崔卫平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18-05719-4

I. 2… II. 崔… III. 人文科学—中国—2007—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085 号

策划统筹	钟永宁
责任编辑	钟永宁
封面设计	张力平 陈小丹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18-05719-4
定 价	36.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

崔卫平

序 言

序

言

正值本年度《人文中国》编定之际，传来了孕妇李丽云因为丈夫不肯签字与肚中胎儿一并致死的消息，令人悲痛不已。各方专家对此事的责任认定，自会有公正裁决，而从中引发的一些此前不曾想到的严峻问题，也需要我们面对。一般来说，制定任何法律法规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个人的意愿是需要得到尊重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医院尊重孕妇的丈夫肖志军本人的意愿，需要他签字是正当的。但是偏偏遇上了这么一个人，他虽然指望妻子无恙，但是却不能相信医院所要采取的剖宫产手术。在众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之后，他仍然拒绝配合，显得完全不可思议。

他的行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对于周围环境和他人的极度不信任，一意孤行。第二，担心签字之后承担责任。他与妻子是事实婚姻，尚未得到对方家长的认可，他疑虑万一出了事情，自己担负不起。第一个层面可以说是“信任危机”，第二条可以说是“责任危机”。如果要追究悲剧的原因，这是两个潜在杀手。

(1

而正是它们挑战了现有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有这样毫无理性的人，是当初制定条例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任何法律法规的执行，需要一个与之相配合的环境，需要人们起码的理性、道德观和责任感，需要来自社会的系统支持。这几年人们习惯听得一个词，叫

做“法律援助”，但同时，法律本身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维护和提供支援的。许多情况表明，不是没有相关法律，而是它得不到来自社会的支持。今年披露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它始终是在半公开的状态甚至光天化日下进行，孙立平先生将之称为“生存生态恶化与底层的沦陷”。当然，“沦陷”的决不仅仅是底层。孙先生指出：“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所谓“人文”的意义就浮现出来了，并且具有一种当务之急的含义，那就是给法律提供支持。人文学者所表达的价值观、道德观、责任观，是一个社会制定法律的基础理念，也是使得法律条文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比如说，法律上不允许杀人，但是人们远非仅仅从法院判决中才知道人是不可以杀的，而是更早便知道人是杀不得的，因为尊重他人的生命，如同尊重自己的生命，而这正是人文学者的表述范围。从生命拥有的尊严这个理念出发，本书所收肖雪慧女士的文章，则往前再推一步，得出了结论：“生命的尊严不是人类专有的”，而事实上，不许虐杀动物正在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新的共识以及制定有关法律的基础。

法律意义上的个人除了拥有个人权利之外，还意味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将自己所作所为的结果担当起来而不是将之推卸，那么同样需要人文学者作出相应表述。应该说我们此前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偏颇的。在我们这里仿佛人人都十分熟练地掌握一种武器——凡是个人遇到麻烦困难，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单个人于其中不必承担什么责任。本文开头提到的孕妇无法获得救治致死，网上有议论认为医院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肖志军本人仅仅是一个底层受害者。当然不应否认肖志军原先生活环境的悲惨逼仄需要改善，但是他本人在妻子得不到应有救助致死的问题上，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他怎么就那么自私、怯懦和迷信？

去年年底由《南方周末》开展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这组讨论，正是为了继续完成必要的有关“个人”的表述。谓之曰“文艺复兴”，说到底还是“个人复兴”，强调个人的独立、尊严和价值，强调成熟的、负责任的个人而不是倚赖的群众一员，正是法律背后的精神体现。刘军宁先生进一步将“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视为能够“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来源。

茅于軾先生挑起关于“为富人说话”的讨论，也是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立场。这个表达很有挑战性，在我们以前的环境中，“富人”就是剥削者，与“敌人”相当。而为穷人说话，哪怕说错了，也因为立场

正确，历来安全。茅先生声称自己“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这样的人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各种各样的麻烦仍然不断：“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为这样的“富人”说话，是为了健全一个社会的法制环境。

秦晖先生的这篇《全球化的第三种可能》，表达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另一种忧虑。由于中国经济始终呈持续发展的势头，国际经济学界对此一片赞美之声，但是其中有别人看不出来而我们自己又较少愿意面对的问题——不受限制的少数人的“自由”与大部分人处于低福利的贫困状态，因此他呼吁：“一个是为自由而限权，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中国的未来改革中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就是所谓为福利而问责，中国的低福利状态也必须转变。”

这些话题都是拓展性质的，对于当下的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人文学科的发展，除了与社会之间进行直接互动之外，还需要与自身小小的传统进行对话，接受自身传统的限制，于其中辨析、辩论，发展出新的富有意义的空间。这也是本书编选的一个重要尺度。

余虹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反思了他的同行们提出的“理论原创性”的问题，当然立足于“中国问题”是一个基本思路与出路，但是如何谈论“中国问题”，却是可以认真讨论的。当有人热衷于谈论“中国与太空”的关系以及考虑中国的“文化输出”时，他们是否考虑过作为谈论的主体，他本人身在何方？他自己与身处其中的“中国”现实有着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生活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之中，他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和面貌？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徐友渔先生持续关注思想学术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在今年又拿出了他关于这项争论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新进展及他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新参照。吴稼祥先生针对王朔的“复出”，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上洋洋洒洒写了万字文，但是读来却轻松自如，在于其文笔犀利活泼。

对于传统文化的热衷，这几年一直在升温，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代中国人对于伦理、价值的渴求。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需要对急迫到手的東西进行反省。陶东风就“于丹现象”作出的分析，虽为一家之言，但是揭示出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潜在维度及危机。李零先生积自己讲授多年

《论语》之心得，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甚至有没读过此书的人仅仅见了这个题目就开始声讨。他自己另写文章，对于这些年崇古复古的思潮进行分析，也是从容自如，嬉笑成章，全仗功力深厚。

人文力量也是一种润泽人的力量，离人文根源最近的也是最受它保护和滋润的。本书收入的几篇关于“人物”的篇章，何与怀先生追忆梁宗岱先生，贺卫方先生记叙大律师张思之先生，都是感人肺腑之作，值得推荐。

关于“民族主义”与“教育”方面的话题，每年都在谈，但是问题并不因此而减轻。既然这样，那就需要继续发出理性的声音。我尤其想要提到刘洪波、鄢烈山、笑蜀等人的时评，本书收入的篇幅虽然有限，但是这种短小、迅捷的文体，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发育和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最大的作用。

是为序。

2007年12月4日



1 崔卫平/序言

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

2 秦 晖/全球化的第三种可能

6 王占阳/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

12 刘洪波/党代表为什么不能“载誉归来”

14 李树桥/关于阳光政治的几点认识

20 余 虹/“我”与中国

文艺复兴

25 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32 杨 鹏/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人文运动

36 崔卫平/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

43 秋 风/道德重建、社会建设与个体尊严

49 李 静/“个人”精神的成熟与“中国文艺复兴”

穷人富人

- 54 茅于軾/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 57 秋 风/贫富共和之道
- 63 孙立平/化解贫富冲突要在调整社会结构

山西黑砖窑事件

- 73 南都社论/必须正视山西黑窑里人性的集体沉沦
- 76 笑 蜀/追问真相，哪怕天塌下来！
- 79 孙立平/生存生态恶化与底层沦陷
- 83 季卫东/解放奴工之路

于丹现象

- 87 周国平/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
- 90 陶东风/于丹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教 育

- 100 张 柠/语文教材改编不要讨好学生
- 102 傅国涌/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课本（外一则）
- 106 钱理群/从我的“屡败屡战”看当今教育

有关感恩

- 111 鄢烈山/“感恩”咋就成了个社会问题？
- 114 曹 林/受害者心态弥漫必然缺乏宽容

- 117 刘洪波/“道义契约”使慈善更像一场道德预审

民族主义

- 120 张 闳/中国愤青的狂暴已接近病态

- 123 邵 建/骂人也是爱国主义教育？

传统与读经

- 126 李 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 139 钱理群/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

——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 151 秦 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记 忆

- 161 徐友渔/写作背后的另一种经验

- 168 吴 思/我的极左经历



2007

思想评论

186 徐友渔/进入 21 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201 吴稼祥/昨天假痞子，今日伪君子

——从营销观点看王朔的表演和价值观宣言

人 物

211 何与怀/他以闷雷般的吼叫告别世界

——怀念梁宗岱先生

220 贺卫方/耄耋律师仍少年

——祝贺思之老八十寿辰暨执业五十周年

223 余 虹/一个人的百年

历 史

231 雷 颐/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236 陈丹青/仍然在野

——纪念星星画展 28 周年

旅 程

243 胡发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旅俄随想

动物保护

265 肖雪慧/生命的尊严不是人类专有的

——访四川龙桥黑熊救护中心

秦 晖

全球化的第三种可能

对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地位，通常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中国的体制不适于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肯定出问题，所谓“中国崩溃论”；还有一种比较积极的说法，认为全球化是对中国的改造，世界会用比较先进的规则改造中国，中国将会和世界接轨，首先讲的是和市场经济接轨，还有讲民主制度接轨，只是没有明确说。我有一个看法，现在来看，除了这两者，恐怕也有第三种选择和第三种可能。

这第三种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中国演变了国际规则，而不是世界演变了中国呢？当然，过去我们经常讲要解放全人类，要用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苦难兄弟，现在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转变了——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用中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种特征的市场经济，改变全球市场经济经过 100 多年已经形成的某些规则。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面前，国际上经济学界一片唱赞歌的声音，这包含了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办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无奈。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国家，这种状况应该是世界上的左派、右派都不满意的，但是现在左派、右派都想用中国的高增长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注解，所以出现了左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的自由竞争还不是很发达，右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福利水平很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版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随着全球的资本涌进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流向全世界，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世界的两大主流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对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趋势：福利国家必须降低福利标准，而自由贸易国家好像最后将不得不重塑贸易壁垒，否则对中国都无法应付，而且这仅仅是开始，这的确是很值得研究。这个现象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批评，国际的批评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所谓要求人民币升值只是这种批评的一个很初步的反映。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左派赞扬中国低自由和右派赞扬中国低福利的状况，不久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这是迟早会出现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在于低工资，我觉得仅仅说中国低工资不能概括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现在中国所有要素价格都很低，如果说中国的低工资是因为劳动力充裕，那中国的低土地成本又是因为什么呢？中国的土地显然不多余。中国低成本使用资源，低成本使用环境是因为什么呢？中国显然也不是资源大国，也不是环境特别好的国家。而且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也是特别廉价的，尤其我们长期以来采用追加公共资金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可能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进行招商的（就是说你能够招来多少钱，我的公共资金会等量投入多少，或者按照一定比例追加多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使用、资源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劳动力的使用都是廉价的，所有这些因素汇到一起，根本在于目前中国体制上利益的博弈不充分，公民社会的进步很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反常地压低所有的一切价格。因此，这种趋势的发展，使得福利国家的趋势不能持续，而且全世界的工会运动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国内的社会紧张，实际上也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紧张，全球化机制把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稀释到全世界，我这里讲稀释而不是化解，因为这种现象很难说是化解。之前，所谓的民主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左或右，基本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博弈，但是在福利国家往往看到责任比较大的国家，当然权力也比较大，所谓自由放任是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它的责任也不会很大，就是说它一边要求权小责也小，一边要求权大责也大一点，但是很少有提出权要大，责要小的主张。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

法国5月份大选出现的萨科奇，他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强化在权力上国家更加强大，这和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福利包袱要卸除，就是在责任方面他要妥协，这就要求更大

权力和更小责任是兼而有之的，这种倾向在以往的西方权力政治中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你说萨科奇是传统意义的左派还是右派，如果你说他是左派，他主张低福利，你说他是右派，他又主张大国家，这个东西很难说。劳资关系失衡、失业增加、移民问题、公共财政困境，所有的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积聚，最后一些人会发现，像中国的做法还是不错的。当然萨科奇是走的第一步，如果沿着萨科奇的道路继续往下走，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小，最后我讲得不好听一点，世界中国化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中国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福音，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福音，而是这两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我想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要改变这种趋势，我觉得也很简单，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要作出努力：一个是为自由而限权，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中国的未来改革中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就是所谓为福利而问责，中国的低福利状态也必须转变。的确，我们应该继续扩展全世界已经被证实为有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人民福祉的那些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扩展现代国家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要保证这种公共服务职能应该是真正的“正福利”。我们国家长期一直搞二次分配，过去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二次分配往往搞成了“负福利”，就是有权力的人收入也多、福利也高，无权力的人收入也少、福利也低，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比一次分配下降，反而还升高了一些。

我们现在要讲建立现代福利制度，首先要避免二次分配，由于我们的体制缺陷，反而变成了向有权有势者倾斜，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盖福利房，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觉得，福利房就看什么企业在盖，如果是私营企业，如果是全部开放竞争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为他们的职工盖福利房，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可是如果是垄断行业，如果是用垄断的方式获得了高额利润的行业，在他们很不正当的高收入的情况下再增加高福利，我觉得就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要避免的，就是“尺蠖效应”，所谓“尺蠖效应”就是说不管是实行放开的政策还是收紧的政策，都有那么一些得利者，另外相当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得利比较少的。

比如，2005年法国发生移民骚乱，实际上严格说不是移民骚乱，而是移民第二代的骚乱。发生了骚乱以后有朋友曾经问过两位法国朋友，说这个骚乱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呢？当时两位法国朋友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说给穷人盖的福利房不能太多地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可是过去中

国人从来没有想过给这些新移民盖什么福利房，恰恰相反，我们不给他们盖，他们自己要盖一些房子，我们还叫它“违章建筑”。我们过去是既不给新移民盖福利房，也不允许他们形成所谓的贫民窟，我们只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所谓的工棚里面，而他们在工棚里面是永远无法在城市定居的。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老实说，自由多，这些人就会私搭乱建，就会形成所谓的贫民窟，如果福利多，就会出现大片的福利公屋区，但是中国这两种在过去都没有，都是单身住工棚，两亿多人生活在单身工棚中，我认为对中国未来发展是有很大大隐患，也会产生畸形的一代。中国很多的留守儿童，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见过父母，很多孩子都是在不太正常的氛围中成长，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价值判断，乃至人们的行为模式都是被扭曲的，这样下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很难设想。我想，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有一些违章建筑，还是国家给他们解决一些福利房（中国最近在花力气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对于维持两亿多人的家庭生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会有很大的意义。

（《南风窗》2007年10月31日）

王占阳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就应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实际状况来看，社会主义实质上首先是一种价值范畴，因而，我们也应当首先从价值角度认识社会主义，而不是首先从科学、制度、历史必然性等等角度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第一位的

苏联理论家曾经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科学，甚至仅仅是一种科学。这就是社会主义理论中只重科学、不重价值的科学主义的理论观念。而实际上，无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实际状况来看，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首要内容都不是社会主义科学，而只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这是因为，首先，在历史上，早在没有社会主义科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时，就已经有了社会主义，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由于在空想社会主义之中包含、贯彻和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所

以，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也始终以是否包含、贯彻和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判断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和社会政治思潮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而并不是以它们是否具有科学性作为判断标准。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思想，就在于它拥有、贯彻和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是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有无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则是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可能是空想的，但它也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有可能是科学的，但它也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没有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说，在社会主义理论之中，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第一位的，社会主义科学则是第二位的。

其次，就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过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尊为“社会主义鼻祖”，而他们从中所汲取和继承的，主要的也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首先由此而成为了社会主义者，而后才进一步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者。所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无到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第一步，然后才是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绝不是以社会主义科学否定和取代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只是在继承、发展和坚持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并以此否定和取代了以往社会主义的空想性。由此，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就在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也都是在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全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实质和灵魂之所在。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思想和学说。这就更加直接、更加有力证明了，即使是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价值性置于首位的。

最后，从科学社会主义内部的价值与科学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价值是目的，科学是手段。价值目的是科学手段的社会属性的规定者，而并非科学是自身社会属性的自我规定者。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首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后才是它的科学理论。而不能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误将作为手段的科学置于首位，甚至是程度不同地否定了社会主义价值观。

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本来面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首要内容，实际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首先是一种价值世界

人的世界，实质上是一个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价值就是各种事物对于人的有用性及其实现。人世间的一切事物、运动、组织、制度、社会等等，都是具有一定的有价值的功能的，这些有价值的功能及其发挥，就构成了人的价值世界。人们以某种“主义”命名某种事物、运动、组织、制度、社会等等，实际就是在指出它们的某种价值性。在这里，所谓“主义”，实际就是某种“客观价值”的同义词。

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实质上也是一种价值世界。人们需要社会主义的运动、组织、制度、社会等等现实存在物，实质上就是需要它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它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是它们的具有社会主义价值的功能及其发挥，就是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因此，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正是在于它们的社会主义价值性。在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组织、制度、社会等等，如果它们是具有社会主义价值的，即能够给社会成员带来普遍幸福的，它们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否则，它们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是否具有社会主义价值性，最终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回答。而将某种结构范畴的东西（组织、制度、体制、社会结构）视为无须检验的当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则在实质上是一种先验主义的观点。

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价值对立起来，但凡主张社会主义性质在于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就斥为所谓“唯心主义”，这实际是不懂得社会主义价值的客观性，特别是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灵魂。应当看到，如果“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毫无价值、毫无用处的客观结构，那它就不是社会主义了，甚至也不是任何“主义”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灵魂并不在于它的结构，而是在于它的具有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功能及其发挥，尽管这种功能本身又是以必要的结构为基础的。这种以必要结构为基础的各种功能及其发挥所构成的现实生活体系，实际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价值世界，而这也正是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之本身。所以说，即使是面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社会主义也仍然首先是一个价值范畴。

既然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社会主义也首先是一种价值世界，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的最高层次的概括，自然也应当是价值层次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这么做的。譬如，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古代氏